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传统诗学对胡适 新文学革命的影响

——以元白诗派、性灵派为例

CHUANTONGSHIXUE DUI HUSHI
XINWENXUEGEMING DE YINGXIANG

郭自虎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传统诗学对胡适 新文学革命的影响

——以元白诗派、性灵派为例

CHUANTONGSHIXUE DUI HUSHI
XINWENXUEGEMING DE YINGXIANG

郭自虎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李克非

装帧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诗学对胡适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以元白诗派、性灵派为例 / 郭自虎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676-3199-1

I. ①传… II. ①郭… III. ①诗学—影响—革命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4879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1YJA751019)最终研究成果

传统诗学对胡适新文学革命的影响

——以元白诗派、性灵派为例

郭自虎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22.5

字 数：3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199-1

定 价：66.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

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奉献的是第三辑，文集作者既有年高德劭的退休老师，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学科领域涵盖中国文学、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等，大

致可以反映文学院学术研究风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新变。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序 言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是说包括诗赋在内的文学创作须在继承中创新求变，这是其生命力不竭之源泉。以此来观察新文学运动中白话诗的发展，理应有其源头作为新变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新文学革命之所以发动是受到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它与传统文学势不两立。

对于胡适倡导的新文学革命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持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认为新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文学的人可能并不多，因为如此会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使新文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较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看法则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并非要彻底反对传统文学，而是在批判中传承和发展，将中国文学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如同东方黎明时分透射出的第一道霞光，似呱呱坠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使人们感受其光彩，分享其喜悦，可是对其在漫漫旅程中如何艰难酝酿与前行却没有多加思考。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学科界限过于明晰，比如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基本局限在各自领域，从而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不仅忽略了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对新文学的一些重要特征如何形成也难以厘清。这就需要以文学史的宏观视野作贯穿古今的“通变”式比较研究，且要拿出可靠的证据；既要对文学个案作深入细

致的梳理与探究，还要对古今文学作前后融通，揭示其具有规律性的发展脉络，既显滟滟陂塘独具个性之美又见暗流相通而形成的河流奔涌之动态美。

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不仅得新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新思潮，而且他们都具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本身就是新与旧的集合体。就新诗而言，胡适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①这种变旧为新，如同黑土地上育出的新苗，似脱蛹化蝶后翩翩飞舞的蝴蝶，无论如何变化出新，总是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根本。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尝试选取几位不同时代的代表诗人作一点探究。以中唐元稹、白居易为起点，以胡适倡导白话诗为终点，在千余年的文学长河中选取宋代杨万里与清代袁枚作为其间过渡的重点考察对象。抓住其主要诗歌理论与观点的传承与发展，以“白话”与“情趣”这两个分属于诗歌形式和内容方面的着力点，对传统诗歌与胡适新文学革命的渊源关系做一番纵向考察，从一个侧面揭示古典诗歌内部的新变因素如何成为胡适倡导白话诗的宝贵资源，为新文学革命奠定深厚坚实的基础。

本书得以展开的内在逻辑如下：一是传统诗歌为新文学革命提供历史依据。胡适以进化的眼光来观察文学发展规律，古典白话诗为其倡导现代白话诗提供了历史依据，表明提倡白话文学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二是传统诗歌成为白话文学创作实践的根据。作为历史材料的证明，胡适就列举出唐诗中的杜甫、白居易以及宋代的王安石、陆游等著名诗人，认为“白话可以作诗，本来是毫无疑问的”。三是传统诗歌理论成为新文学理论主张与新变观的参照。白居易以诗歌干预现实的理论主张，袁枚的诗学新

^①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67页。

变观，作为诗歌传统的精神资源，对胡适新文学革命口号的提出，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本书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1. 诗人之间的前后相关联。杨万里、袁枚对于白居易极为推崇，只是他们在创作中虽有所继承，而不作简单的模仿，依然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白居易诗歌是胡适早期启蒙也是其最喜欢的读本之一：“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人”，在《白话文学史》中，高度称赞白居易、元稹作为中唐杰出诗人所具有的强大创新力，肯定其丰富的诗学思想和诗歌作品，对后世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在新文学革命思想酝酿期间，胡适就很爱读袁枚《随园集》中有关诗歌变迁的文章，胡适新文学革命观念的提出，与受到袁枚的文学思想启示不无关系，强调真性情，以鲜活的语言加以表达，是其共同特征。杨万里、袁枚、胡适对元白的推崇与学习，源于共同的性情、爱好和创作风格。

2. 诗歌使用白话语言的本质在于协调言与意之间的关系。白话是一种与生活较为贴近的语言表达形式，白话的出现是由于达意的需要。从内在根源来看，白诗真切平易风格为时代使然，关乎气运，其讽谕诗议论痛快，如吴刀并剪锋芒毕露，闲适诗则优游从容。袁枚主张用意精深与下语平淡。胡适认为真正的文学是白话文学，新文学的工具就是白话，所著《白话文学史》体现其白话文学思想的多方面内容。

3. 白话与诗歌表达功能的增强。正因为白话的使用，诗歌的表达功能得到增强，从而开拓了诗歌境界。元、白诗笔触延伸非常广泛，表现手法多样，并且留有上乘之作；元白的“社会问题”诗指论时事，将诗歌干预现实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在当时即引起极大反响；元白以新乐府为代表的一些诗作，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反映民生疾苦，在后世得到积极呼应。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增强，元白的“故事诗”善于截取横断面，时间、数字与俸禄等在诗中运用得很普遍。正因为诗歌语言的解放，鸿篇巨制在元白笔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创作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长篇佳作，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与元稹的《连昌宫词》皆为成功范例。袁枚的叙事写

景等诗歌系列能够做到意到笔随，随物赋形，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

4. 白话与对诗趣的追求。胡适认为谐趣是白话诗的原动力之一，白居易以来白话诗人不断探索，以平易的语言写日常生活，努力增强诗歌的趣味。元白以平易的语言表达生活中的闲趣、谐趣与意趣；杨万里以“生擒活捉”、嘲谑等手法、自由流畅而又充满机趣的语言，捕捉生活中的自然之趣，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的写法。袁枚强调诗歌要有生趣，与其贵曲、贵巧的诗歌主张有关，在前人基础上，采用世俗化的夸张比喻及化无情为有情等手法，使其诗歌谐趣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胡适主张诗歌要有天趣，突出表现在其笑谈白话诗，他所作的《答梅觐庄——白话诗》，对非常严肃的话题——文学革命之倡导白话文，以轻松诙谐笔调、对话的形式展开，不避俚俗，自由活泼，趣味横生。

5. 胡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作的尝试。从1911年到1921年，十年内胡适大半时间在美留学，他对白话诗写作做了一系列的尝试，并提出新文学革命的口号，也取得积极成果。对此加以梳理，可以见出胡适早期白话诗创作是如何吸收古典诗歌的养料又努力摆脱其形式上的束缚，从而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白话诗。胡适早期白话诗创作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自发创作、提出口号、自觉尝试三个阶段。胡适对白话诗所作的尝试表现在如下方面：学习民歌的质朴自然，自由表达与词体选择，三句转韵体，散文化句式，多义与联想等。胡适白话诗创作的诗体特征表现为短篇注重句式的整齐与神韵传达，长篇具有散文化与口语化特征。由于白话使用其诗歌的题材范围得到拓展。

本书以诗人诗作为出发点，着重在对具体作品分析基础上，探寻其内在规律，并将不同时代的诗人加以比较，看其在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方面如何继承与发展。只是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极其困难，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每一位诗人都是重量级的，留有丰富作品，值得深入研究，这就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筑桥墩架高铁，费时又费力。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1YJA751019）最终研究成果，项目自2011年立项以来，本人虽然不敢懈怠，而至今依然谈不上圆满，但毕竟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继承与创新:从元白到胡适	19
第一节 元白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19
第二节 杨万里、袁枚对白居易的推崇	29
第三节 从元白到胡适:朋友切磋与白话诗创作	37
第四节 从袁枚到胡适:倡导活的文学	48
第五节 诗由情生——共同的性情	62
第二章 “意与语合”:白话的选择与运用	75
第一节 什么是白话	78
第二节 元白使用白话创作的内在动因	84
第三节 袁枚主张用意精深与下语平淡	121
第四节 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	127
第三章 白话与诗歌表达功能的增强	143
第一节 元白“社会问题”诗的指论与讽刺	144
第二节 晚唐以来诗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155

第三节 诗歌叙事功能的增强	166
第四章 白话与对诗趣的追求	217
第一节 杜诗的惊人语与平易风格对后世影响	218
第二节 元白诗歌的闲趣与意趣	231
第三节 杨万里的“活法”与自然之趣	239
第四节 袁枚诗歌的比拟与谐趣	264
第五节 胡适的诗趣:笑谈白话诗	290
第五章 胡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作的尝试	299
第一节 对白话诗歌创作的理性思考	300
第二节 胡适早期白话诗歌创作的多种尝试	303
第三节 胡适白话诗创作的阶段性特征	315
第四节 胡适白话诗创作的诗体特征	322
第五节 白话表达与诗歌题材范围的拓展	334
结 语	340
参考文献	343

绪 论

公元九世纪初，中唐诗人白居易在贬所浔阳，向远在千里之外身处贬所通州的好友元稹，发出如下疑问：“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与元九书》）他担心千百年后，能否出现如好友元稹那样喜爱自己诗歌的知音。其实，白居易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仅历代皆有喜爱白诗者，甚至不乏一些在诗坛影响甚巨的大家。果然，于千年之后，公元二十世纪初，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时，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人”，对白居易的疑问作了响亮回应，在其所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文学史》中，高度称赞白居易、元稹作为中唐杰出诗人所具有的强大创新力，以其丰富的诗学思想和诗歌作品，对后世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动向来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向从来没有有意的，自觉的改革。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他们的同志有张籍、刘禹锡、李绅、李余、刘猛等。他们不但在韵文方面做革新的运动。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与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与同时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①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胡适认为元和、长庆时代是“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元白作为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决心创造出一种新文学。并认为文学史上的变动都是自然演变的结果，是无意识的，因而也是缓慢的；而元白在这一时代所做的变革是有意识的，是自觉的。他以“光荣灿烂”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学，给予很高的礼赞。

一、作为新文学革命的历史依据

二十世纪初，胡适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更是一次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学革新运动。这场运动的发生，其内外原因固然复杂，而其中动因之一则是历史进化观为其白话文学革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成为胡适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断言：“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①他以进化的眼光来观察文学发展规律，为倡导白话文学找到历史依据，表明提倡白话文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为新文学革命找到“许多证据”，其中之一即是：“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于是断言：“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②显示其敏锐的眼光。胡适于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作演讲，谈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说道：“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一人所提倡的，也不是最近八年来提倡的，新文学之运动是历史的，我们少数人，不过是承认此种趋势，替它帮忙使得一般人了解罢了。”“二千年中之白话文学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什么人也不能否认。”“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白话文学之趋势，在二千年来是在

^① 原载于1917年《新青年》第二卷第5期，《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 原载于1917年《新青年》第三卷第3期，《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1页。

继续不断的，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由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这样说来，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我们对之，应当表示相当的敬爱。”^①说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是中国民族的运动，胡适等人只是对其自然的变化转为人工的，进展加快而已。如此描述，当然会使人们对白话文学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

胡适还列举了许多作为历史依据的白话文学实例，“在这二千年当中，所有一般大文学家，没有一个不受了白话文学之影响。乐府是其一例，今日看一看乐府，尽都是用白话体裁写出，那般创造文学的大文学家，却没有一个不在摹仿乐府。唐朝的诗集子，头一部就是乐府，乐府是白话，学乐府就是学白话，其结果所以都近乎白话。唐朝的诗，宋朝的词，所以好懂，所以就很通行。唐诗三百首，其中所载，大半是白话或近乎白话。”^②苦口婆心，反复申说，目的是为白话文学正名，增强其历史性与庄重性。他将乐府诗、唐诗作为白话文学的典范，很具说服力。

1925年胡适就白话文与章士钊论战时说：“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③指出“有历史的根据”，表明白话文学运动根基的坚牢，“有时代的要求”，表明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有其美好的前景。

二、作为白话文学创作的根据

也正是在上述前提下胡适极力推崇白居易的诗歌。作为历史材料的证明，胡适就列举出唐诗中的杜甫、白居易以及宋代的王安石、陆游等著名诗人，“白话可以作诗，本来是毫无疑问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

① 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原载于1925年10月10日《晨报·副镌》，《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86—87页。

② 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原载于1925年10月10日《晨报·副镌》，《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页。

③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原载于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得、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①

胡适首倡文学革命，固然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文学革命”的口号是国外几个留学生“乱谈出来的”也很能说明问题，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胡适吸取传统文学的精华作为创造新文学的养料。对此，胡明先生从创作渊源上揭示了胡适诗歌创作追求“清顺达意”风格的内在机缘，“与他做诗从学白居易起步并且终其生未能跳脱白居易、杨万里、袁枚一派诗风的影响有关。”并揭示胡适首倡诗学革命的深刻根源：“‘国故’诗学的理论积储与西方诗歌的新鲜经验武装了胡适的眼光见地，锻炼出了他的历史进化意识，为他后来在新诗学革命的新潮里‘首举义旗’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基础。”^②

同为新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钱玄同就将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看成白话之作，他在《〈尝试集〉序》中说道：“以前用白话作韵文的，却也不少，《诗经》《楚辞》固不消说。就是两汉以后，文章虽然被那些民贼文妖弄坏；但是明白的人，究竟也有，所以白话韵文，也曾兴盛过来，像那汉魏的乐府歌谣，白居易的新乐府，宋人的词，元明人的曲，都是白话的韵文——陶潜的诗，虽不是白话，却很合于语言之自然——还有那宋明人的诗也有用白话做的，可见用白话做韵文，是极平常的事。”^③钱玄同列举历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白话诗作，而在众多的唐代诗人中只列举白居易的新乐府作为代表。

不能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寻找文学革命的历史依据仅仅看作是推行白话文学的一种策略，因为胡适对传统文学饱含着深情，尽管胡适早年留学，接受西方新思潮，然而对于传统文学决不妄自菲薄，他在1915年6月6日的日记中列举辛弃疾的几句自由顿挫的词句后抒发感慨：“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徒见其不通文

①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② 胡明：《胡适诗存·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③ 载《新青年》第四卷第2期。

耳。”^①胡适倡导的新文学之根深深扎于祖国的土壤，他首次用“文学革命”一词是1915年夏季之后，而文学革命的思想却是长期酝酿的，胡适曾说：“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②白居易诗歌是胡适的早期启蒙也是最喜欢的读本之一，还是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期间，胡适因得了脚气病，不得不告假医病，住在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他第一次偶然翻读古体诗歌，忽然感觉有很大的兴趣，这其中就包括《白香山诗选》。此后于1907年5月，因脚气病复发，于是回家乡养病，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诗歌创作亦有收获：“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③《胡适留学日记》于1914年8月29日载有作《弃父行》的经过，“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十六岁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全诗如下：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作秀士。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秀才设帐还授徒，脩脯不足贍妻孥。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蹶。关河真令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妇相嫌猜。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阿翁衰老思梁肉，买肉归来子妇哭：“自古男儿贵自立，

①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5期，《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③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